



贾根良,男,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演化经济学会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科技政策、经济史、财政金融与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国代表人物,“新经济思想史”和“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创立者。已出版独立著作 6 部,主编和作为第一作者合著 11 部,主译学术专著 7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 300 多篇。主编和合作主编的丛书有《演化经济学译丛》(2004—2007)、《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2009—)、《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2011—2013)、《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2015—)、《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2015—)。

贾根良

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 与国内大循环的历史起源

摘 要 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适度的贸易顺差造就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失为国家富强的一种道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了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正是这种革命,使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合理走向了“背理”。只有立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用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替代对外贸易顺差,将国内大循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才能使我国继续走向繁荣富强。

关 键 词 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财政;国家货币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1.02.002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现代经济是货币型经济。如果不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颠覆性影响,可能就无法明白我国为什么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我国这种新发展战略的历史起源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对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影响。论文首先讨论赚取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为什么具有合理性,然后论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何导致了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在此基础上,本文扼要说明这种革命对国际贸易的颠覆性影响,阐述它是如何使

作者简介: 贾根良,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6),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支持项目(项目编号:16XNLG08)。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从合理走向“背理”的,最后论证为什么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是走向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家致富的逻辑

要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以及由此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我们首先必须从贵金属货币和金本位制谈起。

在 15 世纪至 18 世纪下半叶西欧重商主义时期,西欧各国发行的硬币以及银行券是以其含金量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也是以黄金结算的,因此,当时的西欧各国注重适度的贸易顺差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一国长期发生贸易逆差会导致黄金外流,这不但将造成本国货币的对外贬值,而且会产生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和资本短缺等严重问题,使生产、就业和消费萎缩,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之中。相反,贸易顺差所产生的黄金流入可以使盈余国增加更多的投资、就业并提高工资。由黄金流入所导致的本国货币升值不仅使进口原材料更便宜,而且企业为了保持或增加出口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推动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将带来更多的黄金流入,使生产、就业和消费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由此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但是,晚期重商主义对于适度贸易顺差的注重从没有采取过“尽可能多地多卖和尽可能少地少买”的措施,而是将其作为推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发展的手段^①。

在世界经济史中,英国最早在 1717 年实施金本位制,但直到 1816 年才在制度上给予正式的确认,从而使金本位制正式建立。此后,一些国家陆续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因此,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英国在实施金本位制之后,其货币或银行券的发行比以前越来越严格地以黄金储备作为准备金。但是,适度贸易顺差推动国家致富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然而,这种从 19 世纪初开始逐步建立的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最终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轰然倒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前,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联合英国于 1944 年 7 月召集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金本位制的一种变种。它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可按 35 美元 1 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其货币以可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与美元挂钩。

如同在金本位制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金融当局通过随时准备买卖黄金或美元调节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任何供需失衡,并有效地将本国货币的价值与黄金和美元挂钩。为了进行这些干预,中央银行(或类似的机构)必须维持足够的黄金(或美元)储备,以支持固定汇率下的流通货币。一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只能通过对其持有的黄金或美元加杠杆来发行本国货币,因此,其货币发行或财政支出能力受到了维持外部平衡的目标的限制,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开支和信用创造实际上与私人部门一样都要受其融资能力的支配。这就是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当政府购买除黄金以外的任何东西时,可以说,他们必须有银行存款来支付。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政府被禁止简单地印钞票来支付它所购买的东西。除了黄金以外,政府用

^①贾根良、张志:《为什么教科书中有关重商主义的流行看法是错误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 年第 11 期。

于开支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需要由税收或借贷来支付。因此,政府在美联储账户上的支出需要不断地被税收收入或借款所弥补”^①。在这种货币制度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只能通过获得更多的黄金或美元来增加本国货币供给,政府的财政开支都必须通过税收或发债来“融资”。

由于美国政府承诺以固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黄金和美元就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成员国调节其国内经济以及相互之间贸易的共同的货币框架。因此,拥有足够的黄金或美元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贸易顺差是建立一个国家黄金储备或外汇储备最可靠的途径,因为一国出口越多,顺差就越大,获得的黄金或美元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顺差国可以更多地发行以黄金或美元作为币值稳定基础的本国货币,私人部门的收入也就不断地得到提高,失业率降低,政府的财政开支能力也因其税收增加而提高。贸易顺差导致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就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出口导向型经济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上半叶黄金作为国际贸易通货情况下,英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②。

在金本位制之下,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因为各国都用黄金支付进口。为了防止黄金储备的流失,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黄金回流,但利率的提高必然引致经济衰退和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同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逆差国由于进口增加导致汇率贬值,从而无法维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因而不得不实施国内紧缩,采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和紧缩财政开支等措施,以维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这就必然导致失业增加,工资停止增长甚至降低。由于紧缩引致工资成本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得到恢复,出口增加,汇率升值,贸易恢复平衡。虽然逆差国也可在一定幅度内调整固定汇率,但如果逆差国多次采取这种办法会带来外汇危机,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不允许的。

但是,正如“特里芬悖论”所表明的,在“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为了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必须使用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这就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地为成员国提供美元供给,但这却与美元的币值稳定目标产生了冲突。这是因为,如果要稳定美元币值,美国就不得不通过国际收支顺差来增加黄金储备。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美国的黄金储备量越来越赶不上美元发行的数量,这就使得美元与黄金按固定兑换比率相“挂钩”的制度日益难以维持。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无法克服的矛盾。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上述困境削弱了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导致人们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需求增加;而黄金储备的减少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有关美元价值被高估的判断。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与越南战争等相关的美国财政赤字开支最终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过热,引发了美元的流动性在全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许多国家担心其不断增加的美元持有量面临持续贬值风险,并对美国是否能够无限期地维持黄金的可兑换性表示质疑。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贸易顺差国纷纷不断地将美元贸易盈余兑换成黄金,使得美国黄金储备量急剧减少,面临着耗尽黄金储备的境地。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种美元盯住黄金、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不再接受按 35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的比价从美联储兑换黄金。大约在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巨变对国际贸易和国家发展战略将产生何等影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继续考察这种巨

①MOSLER W. Soft Currency Economics II [M]. US: Valance, 2012: 40.

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普适的发展道路,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它尤其不适合于具有超大国内市场规模的我国国情。参见贾根良等:《美国学派与 19 世纪美国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变所导致的货币制度变革。

二、国家货币制度的变革与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黄金)与名义货币之间的联系瓦解了,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黄金的非货币化极大地改变了主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其财政能力,因为它再也没有必要通过购买黄金发行货币。从这时起,各国政府就开始彻底地使用本国法定货币(或称作主权货币、国家货币或不兑换货币)作为其货币体系的基础,这就使得“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国家货币制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①。为了简化对其运转机制的说明,笔者以一国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供求为例对此加以说明,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开放经济或国际收支不平衡情况下,这种分析仍是成立的。

首先来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私人部门作为总体,其净货币收入的增长或净金融资产的增加来自何方?有人认为来自税收,但缴纳税收的货币又来自何方呢?显而易见,这必定来自货币发行者。在现代国家中,这个货币发行者只能是作为货币发行垄断者的主权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只能是中央政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属于中央政府机构。中央银行不仅必须应私人部门而且也必须应一国财政部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需要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货币创造的性质却截然不同:财政部通过财政开支创造作为私人货币收入的通货(现金和银行准备金);中央银行则主要是通过再贷款等“出借”通货,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对私人部门的借贷不仅不能增加私人部门的收入,反而会因收取再贷款利息而减少后者的金融资产。因此,只有主权政府的财政开支(货币的公共创造)才能创造私人部门的净货币收入或净金融资产^②。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恒等式: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私人部门的净货币收入。这说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规模大于税收的时候,也就是在赤字开支的情况下,作为整体的私人部门才会有净货币收入的增加。因此,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常态,财政收支平衡或财政盈余是罕见的例外。显而易见,政府赤字开支成为私人部门的财源,而不是税收和政府向私人部门的借贷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财源,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颠倒了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逻辑,带来了国家财政的革命。笔者通过下面的比较来说明这一点。

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假定一国经济持续处于国际收支平衡状态,那么,该国政府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购买本国私人部门新生产的黄金增加货币供给,政府财政开支只能通过增加税收或向私人部门发售国债而融资。当财政开支等于税收时,财政平衡;当税收不敷财政开支之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向私人部门发售国债将私人部门手中的金融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政府在弥补赤字的同时,增加了对实际经济资源的支配。因此,在这些货币制度下,财政赤字确实代表着通常意义上的“债务”或“亏蚀”的含义,政府赤字开支将会挤出私人投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已非货币化。如果一国经济持续处于国际收支平衡状态,该国

^①当国家可以决定何“物”可以作为记账货币的时候,国家货币的时代就来临了。因此,凯恩斯相信,至少在四千年前,“国家货币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在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家货币受到作为其货币价值基础的黄金或美元储备的严重制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国家货币彻底解除了这种羁绊,这是国家货币制度的重大变革,从而催生了笔者所谓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

^②贾根良、何增平:《货币演进的历史观与货币创造的政治经济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货币供给的增加只能通过主权政府的赤字开支来实现,因为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或向私人部门发售国债进行财政开支,只不过是將金融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自己手中,并不能增加货币供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主权政府完全摆脱了黄金货币化对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赤字开支一举两得。它不仅增加了政府财力,而且也导致了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入”,因为政府的赤字开支增加了私人部门手中可用于投资的货币。财政赤字也不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债务”或“亏蚀”的含义,而是以“债务”形式“伪装”的货币供给。如果财政赤字过小,就无法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引致通货紧缩、私人债务激增和经济停滞。可见,国家货币制度的变革引发了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这种革命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法定货币体系下,与商品货币不同,“国家货币”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一种交易手段总是受欢迎的,因为它可以按照约定兑换成具有固定价值的黄金。因此,要让“国家货币”这种本来毫无价值的货币在交换中被接受,就必须引入一种使用动机,这种动机源于主权政府有权力要求其私人部门向国家交税,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税收驱动货币”理论。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货币被接受的根本性原因是国家作为暴力机器强制力的结果^①。

其次,考虑到对币值的商品支持(黄金)和政府开支能力之间的关系被抛弃,而政府是法定货币发行的垄断者,因此主权政府(中央政府)的开支是独立于其收入的,与其税收没有关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财政开支必须使用税收和债券销售为自己的开支进行“融资”。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财政部的开支已完全不受黄金本位的限制,其他国家也没有必要再维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不再需要使用税收和债券销售为自己的开支进行“融资”。实际上,无论是从历史上说,还是从逻辑上讲,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只能在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后,才能使用其对私人部门进行征税。换言之,主权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并通过税收回收货币。主权政府的税收具有多种功能,但唯独不具有作为主权政府财源的功能;但税收却是地方政府的财源,因为地方政府是货币的使用者。

再次,主权政府的开支没有财政能力的限制,但要受到实际经济资源的限制,只要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赤字开支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主权政府的开支没有财政能力的限制意味着货币发行者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商品,也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国家债券。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由此引发了许多人对美国财政破产的担忧。例如,有学者认为,多年以来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张,美国债务快速积累,美国可以说是在向国家破产的方向上加速前进。在他们看来,国家破产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资不抵债或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而导致的危机。因此,他们呼吁,美国存在国家破产的可能是一个需要全球各国认真思考的问题^②。然而,这些学者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混淆了使用货币的主权国家与发行货币的主权国家的区别,也混淆了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和以本币计价的债务的区别。发行以外币计价债务的国家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国家破产的可能,但美国不存在这种可能。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了国家财政和货币制度的革命。在税收和国债并非国家财源或收入的现代货币制度下,货币主权本质上就是国家财政主权,或者说,国家财政主权就是其货币主权,任何损害一国货币主权的行為都是对其国家财政主权的侵犯^③。一个国家只有在完全垄断

①贾根良、何增平:《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界对现代货币理论的争论》,《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6期。

②王文、贾晋京、崔一喆:《美国“财务僵尸化”——疫情期美元潜在破产危机的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9期。

③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自序。

其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其国家财政主权的完整性;只有在国家财政主权得到完整保证的条件下,它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强大财政能力,确保通过资源的调动惠及本国人民,实现物价稳定、攻克核心技术、收入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经济发展目标。由于篇幅所限和本文写作的目的,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的问题,笔者再另文讨论。

三、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从合理走向“背理”

我们现在讨论开放经济或贸易不平衡的情况^①。假设只有甲乙两国,如果甲国财政开支 = 税收或者财政开支 < 税收,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甲国私人部门收入的增加就必须来自对乙国的贸易顺差。否则,该国私人部门作为整体就会处于收入停止增长或负债的状态,而乙国对甲国的贸易逆差则是乙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开支的结果。以美国与其贸易顺差国为例,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贸易顺差国提供的美元资产 + 贸易顺差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 贸易顺差国私人部门收入;假如贸易顺差国政府财政赤字 = 0,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简单地通过赤字开支购买贸易顺差国产品和企业,并为贸易顺差国提供美元资产。这样,美国政府财政赤字 = 贸易顺差国私人部门的净收入 = 贸易顺差国的基础货币。贸易顺差国政府的基础货币发行量相当于取决于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财政部开支就不再受黄金本位的限制。但在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宣传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货币体系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元获得了所谓“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国家愿意净出口到美国换取并积累美元金融资产,那么,美国政府为此进行赤字开支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只有在贸易逆差情况下,美国才能将美元注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假如美国贸易顺差,大量美元回笼到美国,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必然会发生通货膨胀。换言之,在理论上说,只有在其他国家对美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条件下,美国的贸易赤字战略或美元霸权才能得到保障。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霸权的形成对国家致富的道路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出超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②。本文实际上是对2010年笔者提出的这一命题较详细的说明。在提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决策之前,我国实施的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国际大循环构想。但是,在推行国际大循环的实践中,有的国内学者却对美元霸权及其危害缺乏足够的清醒认知,甚至认为“中国是享受到美元霸权的好处最大的国家”“中国是最依靠美元体系的国家”,等等。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的看法,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战略是美国经济战略家运用美元霸权蓄意剥削他国的一种制度安排^③。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质上是美国用美联储账户上的电子数字交换中国商品,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人正在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我们在记录我们拿走了她的多少产出”^④。而美国为了保证美元霸权的垄断性剥削收益和对别国经济

①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经常项目是指一国与外国发生的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存在三种可能的结果:贸易顺差、贸易平衡和贸易逆差。为了简化问题的讨论,本文后面只讨论经常项目问题。

②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③[美]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④Stephanie Kelton, *The Deficit Myth: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Econom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0, p. 80.

的支配地位,对贸易顺差国家使用其赚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实际经济资源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迫使贸易顺差国家使用大量的美元外汇购买近乎零利率和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例如,以2020年10月23日的美国国债为例,美国十年期国债票面利率是0.62%,也就是年化利率为0.62%。按照2010—2019年美国年均通货膨胀率1.77%计算,使用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的美国国债在该年贬值了1.15%。这是按照消费物价指数计算的结果,如果按照资产价格来计算的话,美元贬值的程度将更加严重。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之前,美国按照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规则提供兑换。但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兑换后,美元一直在贬值。按照2020年10月23日的黄金价格计算,1904美元才能兑换1盎司黄金。换言之,以黄金价值来衡量,目前1美元的价值只有半个世纪之前的1/54了。而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这种贬值效应是不可能发生的。

储备美元资产的贬值损失只是实施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弊端之一。实际上,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从中国转移实际经济资源为其所用的一种机制,它大幅度地减少了中国国内可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实际经济资源。同时,它损害了中国的财政主权,中国对美贸易盈余对应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对美贸易顺差越大,中国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来提升财政能力就越难。

早在2010年,笔者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弊端就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讨论了这种战略的长期实施不仅可能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在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上,而且会导致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形成不合理的外需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导致内需长期难以全面启动。这种战略的长期实施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而且造成了重工业低水平过剩和高端技术被跨国公司垄断的不利局面^①。

正如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罗雪尔(Roscher)指出的,历史的方法绝不轻率地赞赏或非难某一特定的制度,因为从来就没有过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适合于不同的货币和社会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就在于剖析一种制度、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某种经济政策为什么或如何会产生‘由理性走向背理’或‘由恩惠走向灾难’”^②。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失为国家富强之道,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等政策对净出口国也是有益的。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家货币制度的变革和发展使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或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逐渐由合理走向了“背理”。这就是我国为什么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深层的历史起源。

四、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是否使用本国货币从事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对国家财政和国民净福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前述讨论已经说明,如果一国使用外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和计价,贸易顺差是损失。因为它不仅损害了本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还导致了本国实际经济资源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如果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和计价,贸易逆差就是收益。因为它不仅增强了本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它还因使用本国货币换取别国更多的实际经济资源提高了本国生产和消费水平,而别国持有的却是本国不断贬值的货币。如果使用外国货币结算但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那么该国

^①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②[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序。

最终会发生外汇危机并引发本国经济危机,这是在拉丁美洲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复上演的悲剧。因此,当一国在无法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时,就应该采取对外贸易平衡战略。只有这样,国家财政能力才能完整地得到保障,并将实际经济资源保留在国内,用于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这就是笔者在2011年提出中国实施贸易平衡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性措施的主要原因。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使用美元进行中美贸易结算和计价时,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 = 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为中国提供美元资产的规模 = 美国从中国转移的本可用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实际经济资源的规模 = 中国政府因此而减少的财政赤字开支的规模 = 中国本可以用于核心技术研发和提供社会保障的财政能力。同时,连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政府 and 私人部门不得不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或者持有在美国银行系统中没有利息收入且不断贬值的美元存款。更严重的是,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过小可能影响了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金融深化至今无法深入展开。

在中美贸易结算和计价货币为美元的情况下,贸易平衡战略就是用增加本国政府财政赤字开支替代净出口,也就是替代美国财政赤字开支,这是最基本的国内大循环,笔者称之为国内大循环 I。中美贸易平衡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相当不同的影响,下表对此进行了比较。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六个方面:驱动引擎、实际经济资源效应、金融效应、带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财政能力和货币发行权、中国私人部门净货币收入或净金融资产的来源。这种比较说明,中美贸易平衡(国内大循环 I)对中国经济显然是非常有利的。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中美贸易平衡对中国经济的不同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对美贸易顺差(国际大循环)	中美贸易平衡(国内大循环 I)
驱动引擎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财政赤字
实际经济资源效应	对美贸易顺差的规模代表着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转移中国实际经济资源为美国所用程度	中国对美贸易平衡表明实际经济资源留在中国国内用于扩大生产和增加居民消费
金融效应	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或在美国银行系统中的美元存款,中国国债市场难以发展,金融深化难以展开	中国国债市场深入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
带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出口乘数	财政乘数、平衡增长乘数(联系效应)
财政能力和货币发行权	在用于核心技术研发和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能力上,美国政府财政能力提高的程度 = 中国政府财政能力的损失程度	中国政府运用财政赤字解决许多重大社会经济挑战的财政能力得到更完整的保护;货币发行垄断权得到完全保证
中国私人部门净货币收入或净金融资产的来源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 + 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 = 0 时,完全等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	完全来自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

许多人认为,只有净外部需求(贸易顺差)才能为一国就业和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动力来源,甚至有极端观点认为,贸易平衡将导致一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熄火,这是受到“对外贸易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①这种传统观点根深蒂固影响的结果,而这种观点在目前的经济学界仍被视为金科玉律。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即使是在这些货币制度下,将对外贸易(实际上是贸易顺差)视作经济成长唯一的发动机也是片面的。正如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指出的,技术创新是经济成长的另一发动机。本文对国家货币制度下财政货币制度革命讨论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否定了贸易顺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理论。因为,在国家货币制度下,积累贸易顺差就是积累他国政府财

①姚曾荫:《对外贸易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学说述评》,《世界经济》1986年第11期。

政赤字。正如在前面指出的,这不仅将导致净出口国政府自身财政能力的损害,而且,还会造成净出口国实际经济资源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

如前述,对外贸易平衡战略实质上是用增加本国政府财政赤字替代净出口,用增加本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替代外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本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贸易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政府财政赤字是本国私人部门净货币收入的来源,没有本国政府财政赤字,也就没有货币供给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市场经济无法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总是表现为货币收入)也无法增长。更重要的是,在贸易平衡条件下,本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开支发行的货币将被用于有助于提高本国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公共产品投资,如教育、医保、核心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等,而非像贸易顺差时用于别国的公共产品投资。简言之,本国人民的物质文化消费水平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非作为货币手段的财政赤字。

显而易见,一旦我国实施贸易平衡的对外贸易新战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总体上就无法来自外部需求,只能来自于对国内市场更宽更广的开发。具体地说,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工人、农民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因此,我国必须通过国内大循环在国内企业的利润增加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之间建立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良性循环机制。二是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相互提供的市场及其区域内部的分工。三是工农业(城乡)之间互为市场,这就需要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就业保障计划。但是,内需的强劲增长必须以核心技术创新作为保障,因为只有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才能为内需提供物美价廉的物质保障,才能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外国货币结算时(在理论上)不发生贸易逆差。这就是笔者在2010年提出国内大循环时所指出的,“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并“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①。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贸易逆差实现的。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后来者来说,通过金融手段推行货币国际化将引发国际强势货币的严重投机行为,反而使本国成为强势货币国际化的对象。因此,我国应该主要通过贸易逆差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在一国货币日益被接受为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货币的过程中,该国就应该在保证供应链不受制于他国的条件下,逐步采取贸易逆差战略,通过对外增加本国货币供给净购买国外实际经济资源,以提高本国政府财政能力,增加国民福利的净收益。

因此,我国应该逐步减少贸易顺差以减少实际经济资源的损失,实施贸易平衡乃至略有贸易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与此同时,实施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必须使用人民币结算和计价,因此,我国可以通过大量进口自然资源、进口一部分低端制成品形成贸易逆差,并出口中高端制成品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实现贸易顺差,并在总体上保持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这种经济循环可以称之为“国内大循环Ⅱ”,是一种更高级形态的国内大循环。在通过贸易逆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下,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和计价范围的不断扩大,我国对外贸易逆差的程度将不断扩大,但我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实施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战略,而应采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笔者曾指出,不能将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能带来收益”这一命题绝对化。美国正是将其推向绝对化才导致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形成了“去工业化”产业格局。如果将“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能带来收益”这一命题绝对化,就有可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走上金融化的

^①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三届高层论坛”会议论文,2010年6月15日。

道路,这种道路是历史上威尼斯、荷兰和英国相继衰落的重要原因。其次,过大的贸易逆差不适合我国人口众多、大量就业需要制造业的国情,将导致我国重蹈美国的覆辙。最后,通过大规模贸易逆差向别国输出本国货币是一种剥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决不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通过贸易逆差获取的收益也应该通过国际援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转型升级再转移回相关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①这必然要求我国实施贸易平衡乃至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全球经济作为总体必然是进出口平衡的,以贸易顺差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可能成为所有国家通行的发展模式。“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可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②。

我国要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必然要求实施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并必然要求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力推进人民币的结算和计价。否则,当出现贸易逆差时并且这种逆差以外币计价时,可能将对我国很不利;而如果为了弥补这种以外币计价的贸易逆差,对外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又将可能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为此,应该首先做到使用人民币对联合国缴费、对外援助以及支付所有国际公共事务中由我国负担的费用,并大力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和计价的比重。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许多国家物资供应短缺,这使我国在推进人民币结算和计价上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有利的谈判地位,我国不仅应该逐步取消出口退税,而且还要通过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劳动者特别是月收入不足 1000 元的 6 亿人口的收入水平等措施,在国内创造条件消化过剩产能,以避免他国通过赤字开支“调用”我国实际经济资源。

(责任编辑:刘险峰)

①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10 页。

②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5 日。